

二十年来日本刊印中国史籍概说

周 迅

中国书是什么时候开始传入日本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说出确切的时间，大约最晚不迟于公元六世纪。宋人《日本刀歌》曰：“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说中国书是秦始皇时由徐福带到日本去的，这当然靠不住，但宋人已经有这样的传说，也就可见其早了。自隋唐以后，络绎不绝地来到中国的日本使节、留学僧和留学生，都着意搜求中国典籍，大批携往日本，则是史有明证的。公元875年，日本皇室藏书处冷泉院失火，皇室藏书几乎荡然无存，藤原佐世奉命重新搜集图书，于公元891年左右撰成《日本国见在书目》，所著录尚有1,579部16,790卷，基本上全部是汉籍，当时中国书在日本之多可见一斑。明清以来，我国的印刷技术更加发达，中日两国的海上交通也更加便利，通过种种途径——包括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输入日本的书籍就更多了。有人估计，仅江户时期（1603—1867）传到日本的中国古籍就达万种左右。从遥远的中世纪开始，一代又一代的日本学者不仅是中国书的热心阅读者，而且在整理和普及汉籍方面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搜集、校勘、标点、研究、注释、翻刻，形成风尚。现代日本的东洋学家们仍继承着这一传统，不断有新的成绩公布于世。限于篇幅，这里只着重谈谈六十年代以来日本出版我国古代历史典籍的情况。

成书于九世纪末的《日本国见在书目》所记载的汉籍中，有许多已不见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以后，随着岁月的流逝，早年传入日本的典籍中，有更多的书在中国已经失传或罕见，其中有些却幸存于日本，因之格外值得珍视。例如一部分唐代抄本、著名的“庆元三史”——南宋版《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已被日本政府指定为“国宝”，作为重点保护的文物。还有一些虽然不能算孤本秘笈，由于传本甚少，要看到也很不容易。利用现代复印技术将这些难得的资料影印出版，无疑是研究工作者所热切盼望的。

足利官学是日本历史最悠久的藏书家之一。从1973年起，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后援会开始影印出版《足利学校秘籍丛刊》，已出三辑。第一辑为日本“国宝”之一南宋版《周易注疏》。此书每卷卷末有端平年间陆子适（陆游之子）的跋语，可证为宋刻宋印。第二辑为南宋版《毛诗注疏》。第三辑南宋版《文选》，也是“国宝”之一。“国宝”《汉书》，是南宋庆元年间刘元起、黄善夫刻本。据藏书印考证，最晚在明初它已为日本藏书家所珍藏。此后虽经数百年辗转相传，还是纸墨如新。书的封面上有十六世纪末日本南化和尚（名玄兴，卒后被封为“定慧圆明国师”）的亲笔题签和“玄兴”二字的篆文方印。1977年，“国宝”《汉书》在平中苓次博士追悼纪念会主持下，由京都朋友书店影印出版。书前有内田智雄序和平中苓次在二十多年前写的《米泽的宋版前后汉书》一文，介绍了庆元本前后汉书的版本特色及其在日本流传的经过。1980年，古典研究会影印出版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的北宋版《通典》，全书计八册，其第八册为别卷，载有尾崎康所撰的长篇解题。1981年同朋舍出版的《唐钞本》（大阪市立美术馆编），是流传在日本的各种唐钞本的图录。其中有《春秋经传集解》、《玉篇》、《世说新语》等的残

卷，都是全卷刊载。

古典研究会还陆续影印了一批有关我国历代典章制度的善本史籍。如1963年影印出版静嘉堂文库所藏宋本《名公书判清明集》，此书在1935年曾被收入我国的《续古逸丛书》，这次影印，附有日本著名版本目录学家长泽规矩也的版本解说和著名法制史家仁井田陞的解题。1966年至1967年影印出版了万历7年刊本《皇明制书》，这是以东洋文库所藏20卷本、蓬左文库所藏14卷本、内阁文库所藏不分卷本互相参校、互相补充后影印的，附有山根幸夫的解题。1966年影印出版明钞本《皇明条法事类纂》50卷，这是清嘉庆年间有名的藏书家陈鱣的旧藏，现藏于东京大学附属图书馆。1968年影印出版了静嘉堂文库所藏南宋法典《庆元条法事类纂》钞本。1972年影印出版了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收藏的光绪年洪氏刊本《大唐开元礼附大唐郊祀录》，附有池田温的解题及《大唐开元礼》和它被《通典》引用部分的对照表。此书在1981年又出了第二版。

六十年代在德山市毛利家藏书中新发现若干善本，引起了日本学术界的注意。德山藩是日本中世纪的一个小藩。第三代藩主毛利元次（1667—1719）是一个藏书家，也是一个汉籍爱好者。他的藏书中有汉籍七百多部。这些典籍代代相传，到明治29年（1896）大部分献给宫廷，收藏在宫内厅书陵部，其余仍存在德山市毛利家。1963年至1965年，由日本文部省提供研究费，对毛利家藏书进行调查编目，清点过程中又发现十几部善本，其中有元泰定元年（1324）建安刘氏日新堂重刊《新编事文类要启札青钱》一种，分为前集，后集、续集、别集、外集，共51卷，是一部专供起草书翰文参考的类书。其门类有节序、喜庆、饮食、游观、器用、币帛、请托、荣达、仕进、师友等，也可以说是一部日用百科全书，包含着丰富的社会生活史料。此书在我国仅见于《四库全书存目》，著录为“《启札青钱》（《永乐大典》本）”，只有18卷，显然与此本大有出入，很可能是它的节本。又有胡宗

宪著《三巡奏议》一种，是明嘉靖28年至34年（1549—1555）胡宗宪任直隶、湖广、浙江巡按使时期的奏议，多半有关明朝政府对所谓“南倭”、“北虏”及对南方一些少数民族的政策。胡宗宪是明代亲身参与抗倭的将领，这是现今发现的他的惟一一部著作。（《筹海图编》虽署名胡宗宪辑，实出自其幕僚郑若曾之手。《明经世文编》收有胡宗宪的论著三卷，两卷辑自《胡少保奏疏》，一卷辑自《胡少保海防论》，但两书已不可见）。以上两种书，日本学者断为海内孤本，已分别在1963年和1964年由东京书肆大安影印出版。

此外，近藤出版社于1974年出版了原色影印的《倭寇图卷》。此图原题为《明仇十洲台湾奏凯图》，现藏于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据传是明代画家仇英（？—1552前）的手笔。在高32公分、长522公分的画卷上，描绘着倭寇出现、登陆、抢掠、放火、百姓逃避和明官兵出击的全过程，不但是一件艺术珍品，也是一件十分珍贵的形象史料。

二

我国的印刷技术传入日本以后，为了满足对汉籍的需要，除了直接从中国输入以外，日本自己也翻刻印行了不少汉籍，即所谓“和刻本汉籍”。日本版本目录学家长泽规矩也在1976年编印了《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所著录不下五千部。七十年代以来，在长泽的主持下，由汲古书院将这些和刻本汉籍有计划地选择影印。1970年至1973年首先出版了《和刻本正史》30册，收《史记》、《汉书》等15种。另有别卷8册，收《东都事略》、《南宋书》、《明史稿》、《廿二史札记》四种。1972至1978年出版《和刻本汉籍随笔集》20册，收录中国历代随笔93种。1974年出版《和刻本明清资料集》6册，收《明季遗闻》、《中兴伟略》、《夷匪犯境闻见录》、《盾鼻随闻录》、《武备志》、《神器谱》等。1975至1976年出版了《和刻本经书集成》7册及

《和刻本诸子集成》12册。1976至1977年出版《和刻本类书集成》6册，收录自唐至清的小型类书21种。1977至1978年出版《和刻本汉籍文集》20册，收唐、宋、元、明、清各代合集、别集、文钞、尺牍等90种，另有别卷一册，为《历代名人奏议》。1977至1978年出版的还有《和刻本书画集成》12册；它的最后两册是清彭蕴璨所编《历代画史汇传》，收录了画家7,500多人的小传，是一种很有用的工具书。上述各种和刻本集成所收的每一种书，都附有长泽规矩也撰写的简要解题。

“集成”以外，汲古书院还在1973年影印出版了明治17年（1884）东京凤文馆刊“山名本”《资治通鉴》（山名善让训点）。同年影印出版了小畑行简训点的日本嘉永3年（1850）序本《福惠全书》。1978年影印出版日本元禄12年（1699）弘章堂刻本《大明一统志》。1981年影印出版的熊本藩训译本《清律例汇纂》，是日本天保年间（1830—1843）熊本藩主细川齐护命儒臣训译的，是京都大学图书馆所藏的一个写本。

为了配合法制史研究，律令研究会在1975年影印出版《（官版）唐律疏议》。这是唐代“永徽律”的律文注解全书，是我国现存最系统的一部古代法律著作。《（官版）唐律疏议》刊于日本文化2—3年（1805—1806）。当时在幕府主持下，曾为官学“昌平坂学问所”刻印了一批教学用书，这批官版书大多按照宋元精校本翻刻，刻印的质量也比较好，《唐律疏议》即其中之一。此书曾被我国《万有文库》和《国学基本丛书》作为底本。

和刻本的可贵之处，一方面在于它们之中有许多是按照早年传入日本的汉籍翻刻的，它们所根据的汉籍原版，有的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另一方面，这些和刻本在刻印之前，往往经过日本学者的加工，在校勘、圈点、注释以及序言和题跋中，融进了日本学者的研究心得。例如《和刻本正史》所收的《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都是日本元禄至宝永年间（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据明南监本翻刻的。德川幕府五

代将军纲吉的宠臣柳泽吉保（1658—1714）在任川越城主期间，开始组织翻刻南监本廿一史。他网罗了一批名士任校订之责。其中《晋书》、《南齐书》等的校订、句读者荻生茂卿，即荻生徂徠（1666—1728），是日本汉学中曾风靡一时的徂徠学派（一称藤园学派）的创始人。其他如志村禎幹、安藤东野、细井广泽、矢野拙斋等，也都是当时的名儒硕学。《和刻本经书集成》所收日本宽永5年（1628）京都容膝亭本《五经》的训点者藤原惺窝（1561—1619），是日本儒学的奠基人，被目为“德川三百年文教开山之祖”。宽文8年（1668）荒川宗长刊本《公谷白文》的训点者林罗山（1583—1657），是日本朱子学的代表。他是藤原惺窝的弟子，“于天下书无不读，其所著凡百余部，皆可传也”。其他如《和刻本汉籍文集》中《陆定公全集》的注释者石川香山、《欧阳文忠公全集》的训点者清田儋叟、皆川淇园、《沧溟先生尺牍》等的训点者田中兰陵等，也都是德川时代的知名汉学家。他们的见解尽管不免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但是对于我们今天整理古籍仍然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三

近三十年来在日本出版的中国古代史籍中，更加值得重视的是日本当代学者的劳绩。尤其在满文史料和我国典章、法制史料的整理方面，似乎成绩更为突出。

东洋文库是整理满文史料的一个中心。用满文书写的清太祖、太宗两朝的官修历史《满文老档》，过去虽有藤冈胜作过简略的日译，但只是一个未定稿。1943年至1944年今西春秋在《书香》上发表过《满日对照满文老档》，也因战乱，没有完成就中断了。战后，东洋文库清代史研究室神田信夫、松村润、冈田英弘三人从五十年代起开始译注《满文老档》，共分七册，从1955年到1963年由东洋文库陆续出版。1969年，台北公布了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旧满洲档》，神田信夫等又着手译注《旧满洲档》。

1972年首先由东洋文库出版《旧满洲档天聪九年》第一册，1975年出版第二册。译注者在序文中说，所以首先选择天聪九年，因为这是清入关前至关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清太宗皇太极消灭了成吉斯汗后裔察哈尔部的林丹汗，统一了满、蒙，对内结束了内争，次年即正式即位称帝，改元崇德，并改国号“金”为“清”。而且《满文老档》缺天聪七、八、九年，这一段恰好能补《满文老档》之缺。1972年，东洋文库还出版了该文库清代史研究室所编的《镶红旗档——雍正朝》。镶红旗的满文档案共计2,400余件，时间从雍正元年（1723）延续到1925年，从1936年起收藏在东洋文库。《镶红旗档——雍正朝》收入了54件雍正朝的奏摺，是研究清朝八旗制度的第一手材料。以上三种满文史料，都是先将满文转写成罗马字，然后逐字逐句直译成日文，再附以意译。

整理满文史料的另一项成果，是今西春秋编、天理大学出版的《校注异域录》。《异域录》是十八世纪初清人图理琛奉康熙帝之命出使土尔扈特，途经蒙古、西伯利亚、俄国的旅途见闻，比较系统地记载了各地的山川、道里、民俗、物产、户口、军备等，多有前人舆记所未载者，并附有地图。此书一向有满、汉两种文本流传。两种文本内容大致相同，而满文本较详。今西春秋的校注本由“满和对译异域录”、“影印满文异域录”、“影印完结本汉文异域录”三部分组成。占篇幅最多的满、和对译部分，不仅将满、汉文本进行了对校，译成日文，而且附有详细的注释。这一部分的原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在北京完成的。1954年作者被释放归国，1956年由于作者的请求和郭沫若同志的关怀，将手稿送还日本，到1964年出版，前后历时二十余年。所谓“完结本汉文异域录”，是今西春秋新发现的孤本。原来流传的满、汉两种文本末尾均有脱简，此本却结尾完整。所补足的数千字，主要是图理琛的三篇奏摺，都是有关清、俄关系，特别是有关准噶尔问题的新资料。这一“完结本”和“满文本异域录”，都是

第一次影印问世。

公元七、八世纪以后，我国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制度曾给予邻国日本以深刻的影响，一度成为日本热心仿效的对象。因此日本古代的典章制度与我国古代的典章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国一些有关典章制度的史籍在日本受到格外的关注，自在情理之中。在这方面，除影印了一批有关的善本书已如前述外，当代学者也进行了不少的研究探索。

1962年，原田种成校订的《贞观政要定本》，由无穷会作为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三辑出版。《贞观政要》在唐代就通过遣唐使和留学生传到日本，朝野都很重视。“博士之家”往往有家传秘本，据以进讲经筵，或向诸侯呈说，所以传到今天的旧抄本、旧刊本不一而足，内容也互有出入。如新发现的龙谷大学图书馆藏写字台文库原藏旧钞本，其卷四篇目与诸本大异。原田氏认为，吴兢所撰《贞观政要》原有两种本子，进呈唐中宗的是初进本，进呈唐玄宗的是经过修订的再进本，写字台本则属于初进本。宋以后这两种本子已被混淆。《定本》以建治元年（1275）旧抄卷子本为基础，用钞本20种、校本3种、刊本12种及其他资料13种进行校勘，注明异同，以“复吴兢原撰之旧”，并以原田种成所撰《日本流传的贞观政要之研究》一文附于卷末。《唐六典》也是记载唐代制度规程的一部重要著作。广池千九郎训点、内田智雄补订的《大唐六典》一书，可以说是凝聚着日本两代学者的劳动。广池千九郎（1866—1938）是日本东洋法制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为了比较中日两国的律令，曾有志于注释《唐六典》和《唐律疏议》，但未能完成。经过他训点的这一部《唐六典》，在他去世后一直存放在广池学园的书库里，直到1972年才发现。内田智雄将这一手稿与南宋绍兴刊本残卷等作了进一步的对校，对广池的训点也有若干改正，于1973年完成，由广池学园事业部出版。出版时附有内田智雄所撰的解题9页，同时编了目录，以便检索。同样是为了比较中、日两国的律令，1979年东文堂出

版了律令研究会编的《唐律疏议译注篇（一）》。这是《译注日本律令》的一部分。日本律是以唐律为蓝本编纂的，早因战乱而散佚，只剩下一些残卷和后人辑集的部分佚文，因此要研究日本律非参考唐律不可。《唐律疏议译注篇（一）》，译注了《唐律疏议》的首篇《名例》57条，前有序录，对律疏中常见的亲属称谓等用语加以说明，然后将各条以汉文训读体译出，再附以译注和解说，最后有事项索引。

元代的典章，由于文体特别，比较难读。战后在日本带头组织研读元代典籍的，一是京都大学，一是东京教育大学。《元典章》全名《大元圣政国朝典章》，记元英宗以前的典章制度，其史实多有不见于《元史》者。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元典章研究班从1950年起，根据《元典章》的各种版本——包括毛氏汲古阁藏元刊本、陈垣《元典章校补》、英国剑桥大学所藏威妥氏收藏品中的钞本等，首先对《元典章·刑部》进行集体校读。中国刑法志研究会1964年出版的《（校定本）元典章刑部》第一册，就是他们十几年研究成果的一部分。第一册包括《刑部》的前十卷，经过校订，加上了句读。卷末附有吉川幸次郎《元典章中的汉文吏牍文体》和田中谦二《元典章中的蒙文直译体文章》两文，帮助阅读者掌握《元典章》这两种特殊文体的特点，减少阅读的障碍。东京教育大学从1958年起，由小竹文夫、冈本敬二等组成中国刑法志及元代史研究会。它的第一个成果是1962年出版的《元史刑法志的研究译注》一书（小竹文夫、冈本敬二编，教育书籍刊）。内容包含《元史·刑法志》的译和注，还有研究《元史·刑法志》的论文5篇，以及从1879年到1961年间有关元代史的日文论著目录。元英宗时代颁行的《大元通制》的条格部分《通制条格》，和《元典章》一样，几乎都是元代特有的吏牍体和蒙文直译体的文章。传本只有原北京图书馆所藏明钞本（存22卷，1930年曾影印）。东京教育大学中国刑法志研究会做的另一项工作，是从1960年起对《通制条格》进行了集体讲读，1963年

出版了《通制条格的研究译注》第一册，1975年和1976年分别出版了第二册和第三册（小林高四郎、冈本敬二编，国书刊行会出版），将《通制条格》全文加句读、日译、注释，并附有128页的索引。元代在1291年还曾颁行《至元新格》，但此书已经失传，其条文散见于《元典章》和《通制条格》中。植松正有《彙辑至元新格及其解说》一文，辑录了《至元新格》佚文95条，加以整理，发表在《东洋史研究》30卷6期（1962年3月）上。

中国正史中的“志”，也是我国典章制度资料的宝库。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内田智雄继1957年在《同志社法学》上发表了《译注汉书刑法志》（1958年出版单行本）之后，1958至1961年发表《译注晋书刑法志》，1961至1962年发表《译注魏书刑法志》，1963至1965年发表《译注隋书刑法志》，1966至1969年发表《译注旧唐书刑法志》，均在《同志社法学》杂志上连载。1963年和1970年由创文社出版了内田智雄编《译注历代中国刑法志》一、二册。《元史·刑法志》则有东京教育大学元代史研究室的译本，已如前述。

食货志的译注始于加藤繁。日本大正年间，加藤繁、和田清接受帝国学士院的补助，开始译注历代食货志。加藤繁译注的《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和《旧唐书食货志·旧五代史食货志》曾由岩波书店出版（1977年重版）。加藤于1945年去世。战后，周藤吉之、西岛定生、青山定雄、中岛敏、山根幸夫等人组成食货志研究会，在和田清指导下，继续完成了《明史食货志译注》（1957年东洋文库出版），1960年又出版了《宋史食货志译注》（一）。除研究会的集体成果外，近年来，又有古林森广的《（试稿）宋史食货志·酒·译注》（见《明石工业高专研究纪要》13，1972年8月）、黑羽英男的《汉书食货志译注》（1980年明治书院出版）等。多年研究中国交通史的山形大学教授星斌夫，除担任《明史食货志译注》中的漕运部分以外，还在1962年发表了《清史稿漕运志译注》（见《山形大学纪要》5—1），1973

年发表了《元史·明史海运志译注》（见《山形大学纪要（人文科学）》7—4）。为了研究的方便，1936年上海大光书局曾将历代食货志汇编成册，1942年日本人松崎鹤雄也编过食货志的汇编本，由满铁调查部印行，但这两种本子校勘不精，而且现在已难得见到。1965年日本极东书店出版了中岛敏的新校订本，以殿本为基础，用百衲本对校，文字的异同用脚注形式记在每页下端。题名为《对校十三史食货志（附清史稿食货志）》。

四

日本当代学者对中国史籍的研究还涉及其他许多方面。在正史的“志”和“传”方面，还有塚本善隆的《魏书释老志的研究》（1961年京都佛教文化研究所刊）。它的第一篇是“解说篇”，长达71页，介绍了《魏书·释老志》的历史背景。占篇幅最多的是第二篇“译注篇”，在参照多种资料对原文进行校勘之后，加以译和注。末附研究北周佛教政策的论文两篇。此书可以说是塚本氏研究北魏佛教二十余年的一个总结。1978年，京都朋友书店出版了大谷大学教授野上俊静的《元史释老传的研究》，包括《元史·释老传》的译注及关于元代佛教史的论文九篇。此外有兴膳宏、川合康三的《隋书经籍志序译注》，在《中国文学报》上连载（见《中国文学报》25、27—32期，1977年至1980年10月，未完）。

研究中日关系史多年的茨城大学名誉教授石原道博，早在五十年代初就和和田清合作发表了译注本《魏志倭人传·后汉书倭传·宋书倭国传·隋书倭国传》及《旧唐书、宋史、元史日本传》，分别在1951年和1956年由岩波书店出版，并多次重版。1975年国书刊行会印行了石原道博的《译注中国正史日本传》，在旧作的基础上，增加了《晋书》、《南齐书》、《梁书》、《南史》、《北史》、《新唐书》、《新元史》、《明史稿》、《清史稿》的日本传。除影印原文和译、注外，还附有中日关系

史年表、解说、索引及二十多页参考文献目录。1971年到1973年，平凡社出版了内田吟风等人译注的《骑马民族史——正史北狄传》3册。1974年到1976年又出版了井山秀雄等译注的《东亚民族史——正史东夷传》2册。福本雅一有《隋书流求传译注稿(一)》。见于《亚细亚文化》11卷4期(1975年3月)。内田吟风还在1970至1972年发表《魏书西域传原文考释》(见《东洋史研究》29卷1期、30卷2、3期、31卷3期)，并在1980年与小田义久等四人一起印行了《中国正史西域传的译注》(龙谷大学文学部刊)。但此书除《魏书·西域传》和《南史·西域传》是全文译注外，《后汉书》、《隋书》、《旧唐书》的西域传都只收了序、跋或赞。

正史之外，平凡社出版的一批史籍译注本，也有一些是应该提到的，例如松枝茂夫译《蜀碧·嘉定屠城纪略·扬州十日记》(1965年)、增井经夫译《史通——唐代的历史观》(1966年)、增井经夫译《焚书》(1969年，包括《焚书》和《续焚书》)、薮内清译《天工开物》(1969年)、佐藤武敏译注《盐铁论——汉代的经济论争》(1970年)、长泽和俊译注《法显传·宋云行纪》(1971年)、梅原郁译注《梦溪笔谈》(1978至1979年)等。《元朝秘史》最早的日译本是那珂通世翻译的《成吉思汗实录》，刊行于日本明治40年(1907)。1970至1976年，平凡社出版了村上正二的新译注本，题名为《蒙古秘史——成吉思汗物语》。由于它较好地吸取了前人的成果，有人称它为那珂通世以来《元朝秘史》各种日译本的“集大成版”。平凡社还在1978年刊行了守屋美都雄译注、布目潮风、中村裕一补订的《荆楚岁时记》。《荆楚岁时记》成书于公元六世纪，原书早已散佚，只留下一些佚文。守屋美都雄早年曾据《汉魏丛书》所收的辑本译出，1950年由帝国书院出版，题名为《荆楚岁时记——中国民俗的历史研究》。出版以后，作者对所依据的底本和自己的译注都不满意，决心修订，首先以《宝颜堂秘笈》本为基础重新作了辑本，

这一新辑本刊载在1963年帝国书院出版的《中国古岁时记之研究》第二篇。由于守屋氏在1966年去世，译注的修订没有来得及做完，由布目、中村二氏在遗稿的基础上继续完成。

中国古籍的校订本，值得注意的还有泽田瑞穗的《校注破邪详辨——中国民间宗教结社资料》（1972年道教刊行会出版）。

《破邪详辨》6卷，是清道光年间沧州知州黄育榘所著。元明清三代，民间秘密宗教组织白莲教一直相当活跃，多次被农民利用为组织斗争的工具。黄育榘从镇压农民斗争的目的出发，曾派专人对民间流传的所谓“邪教”经典作了调查，共得六十八种，在书中一一叙录，并引用其语句，转述其教理，加以批驳，客观上却为后人保存了丰富的民间秘密宗教结社的史料。据校注者考证，此书所收的六十八种民间宗教经典，大约三分之一现已下落不明，只能根据本书了解它的名称和内容，可见它在研究上的价值。此书在我国只有清道光年和光绪年版本，今由泽田氏校注出版，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1977年吉川弘文馆出版了竹内理三氏校订、解说的“国宝”《翰苑》。类书《翰苑》据《新唐书·艺文志》、《日本国见在书目》等著录为30卷，早已散佚，“国宝”《翰苑》是仅存的一卷，收藏在日本太宰府天满宫，是一个旧钞本的残卷。原文卷次不明，内容为“蕃夷部”的“匈奴”至“西域”以及全书的后叙，据此推断是《翰苑》的最后一卷即第30卷。此卷在日本大正年间曾收入《京都帝国大学景印唐钞本》，现在已不易见到。1978年又有汤浅幸孙的《关于国宝翰苑——销夏玩物小志》一文。汤浅氏认为竹内的校订本在校订、句读等方面错误甚多，因此对它又重作校订、圈点，并写了详细的校注，载于《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第18期。1981年，汲古书院开始陆续出版原田种成编的《（训点本）四库提要·经部》。它根据同治7年广东书局重刊本，加上了训点和句读。这是原田氏指导后辈十几年进行会读的成果。

上述种种成绩，多半是日本当代学者多年心血的结晶。在这

些校勘、译、注中，不仅包含了译注者的心得，往往还反映着当时日本国内外的研究水平，这一点在注释部分看得尤其清楚。许多史籍的注释，并不仅仅是考订和解释各种名词术语，而且常常引用很多文献与论文，指出原著的谬误，介绍前人的研究情况和不同的论点，与其他有关的史料作比较等等，为后来的研究者创造了继续深入探索的良好条件。

五

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懂汉文，许多人会用汉文写诗作文，阅读汉籍当然更不在话下。明治维新以后，特别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西方文化的影响和冲击下，日本青年一代能够直接读懂汉文的人越来越少了，对于古代那种训读式的译解也已经很不习惯。但是，日本传统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如此密切，以至可以说，如果不了解古代中国，也不能真正了解古代日本。因此，不仅是研究中国的学者，而且日本一般民众对中国的古籍仍然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为了适应这种形势，就有大量中国古代典籍被译成现代日语，加上注释和介绍，以满足现代日本人的需要。前面谈到的有些译注本，也是属于此种努力的一部分。

为了让新一代的日本人能够读懂汉籍，实力雄厚的出版社还往往大量延揽专门人才，出版成套的中国古籍译注丛书，如平凡社的《中国古典文学大系》60卷、明治书院的《新释汉文大系》⁶5卷、集英社的《全释汉文大系》33卷、明德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新书》达百种以上，以及朝日新闻社的《中国古典选》、《中国文明选》、德间书店的《中国的思想》等等，其中都包括不少史书。这些译本或译注本几乎都有详细的题解，介绍本书产生的历史背景、作者的生平和思想、全书的结构、内容、版本、历代的有关研究成果等等，有的还附有索引和参考文献目录。它们尽管属于普及性质，但由于执笔者多是研究有素的专家，在题解和

性的著作，往往有详尽的题解提供必要的预备知识，并附以各种辅助工具如索引、参考文献目录和有关的表格等，既便于检索，又便于进一步深入学习，为阅读者设想得相当周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当我们开展整理古籍的工作之际，这些对于我们都是很有启发的。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制订古籍整理和著述规划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三届年会于一九八二年七月廿四日至卅日在兰州市举行。会议讨论修改了学会章程，改选了理事会，选举了会长、副会长，增设了学术委员会和会刊编辑委员会。大家一致推选张舜徽教授连任会长，增选彭铎、刘乃和为副会长，并决定聘请尹达、白寿彝、张政娘、顾廷龙、陈千钧、商承祚、程千帆、谢国桢为学会顾问。大会交流了古籍整理、史学史、历史文选的科研教学经验，制订了新的科研规划。该学会会员已进行和计划进行的古籍整理和著述项目有：（一）《历史文选教学经验汇编》；（二）《子书研究》（战国至秦汉）；（三）《历代史话丛书》，包括《人才史话》、《地理沿革史话》、《方志史话》、《职官史话》等；（四）《史学名著研究》（《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等）；（五）《宋史人物传记选注》（上、下册）；（六）《三国志选译注》；（七）《明史选注》；（八）《中国古代哲学家传记资料著释》；（九）《史记太史公自序注说会纂》；（十）《中国古代妇女资料汇编》；（十一）《司马迁思想资料注评》；（十二）《版本丛书》；（十三）《中国古代文学家传记选注》；（十四）《中国古代军事家传记选注》；（十五）《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选注》；（十六）《中国古代史学家传记选注》；（十七）《文献学论著辑要》；（十八）《中国史学家传》；（十九）《第三届年会论文集》等。

• 刘 宣 •